

傅斯年與《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遠 耀 東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下稱《集刊》）六十六本第一、二、三分的《傅斯年先生百歲誕辰紀念集》，已於民國八十四六月，在台北出版。距傅斯年民國十七年十月，在廣州創辦的《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已經六十六年了。

在過去一個多甲子的歲月裡，中國經歷了不同的動盪時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動盪中播遷，前後由廣州、北平、上海、南京、長沙、昆明、四川李莊、南京、台灣楊梅、最後南港舊莊；由華南到華北、從東南到西南，最後遷台，九次遷徙^①，行遍大半個中國。雖歷經艱辛，但歌絃不絕，而《集刊》且能持續出刊，在中國同類學術刊物中，的確是少見的。

《集刊》的創刊，象徵著中國史學的研究真正從傳統邁向現代。以後《集刊》繼續出版，影響中國現代史學的層面擴大。所發表的論文從上古到明清，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其內容則有民族、政治、經濟、法制以及地理和自然科學的論文。和《集刊》性質一類的學報，如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清華大學的《清華學報》，燕京大學的《燕京學報》，輔仁大學的《輔仁學誌》，雖有類似之處，但祇有《集刊》從出版以來，差不多沒有間斷過，而且是集稿態度單純而嚴肅的。^② 本文分別自：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與《中山

① 李濟，〈傅斯年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幾個基本的觀念及幾件重要工作的回顧〉，《革命人物志》第十三集，後收入傳記文學社的《感舊錄》。

② 勞榘，〈傅孟真先生與近二十年來的中國歷史的發展〉，《大陸雜誌》二卷一期，民國41。

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二，〈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與〈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三，《六同別錄》與《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討論傅斯年創辦的這份學術刊物的形成與發展。

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與《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

《集刊》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立而創刊。歷史語言研究所則由傅斯年向當時的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倡議而設置的：

（十七年）一月，國立中山大學文科主任，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籌備委員傅斯年，向大學院院長蔡元培陳述語言學與歷史學的重要，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③

所以，傅斯年是歷史語言研究所與《集刊》的創辦人。自此至其遽逝，一直掌握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並堅持《集刊》發刊的工作旨趣。李濟說：「傅斯年先生創辦本所，建立工作基礎，製定研究方針，綜理所務，前後二十三年（1928-50）」^④。當時傅斯年在廣州，任國立中山大學文科主任，並兼國文、歷史二系主任。傅斯年於民國八年去國留學，民國十五年冬歸國，返里探親後，即轉赴廣州擔任此職^⑤。傅斯年任中山大學文科主任，是朱家驊舉薦的。民國十五年朱家驊主持中山大學的校務，爲了充實文學院，想找一個對新文學有創造力，並對新史學負有時名的學者，主持國文和歷史系。

③ 王懋勤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事年表〉，引〈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慶總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民國57。

④ 李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四十週年紀念會報告〉，《集刊》第四十本上冊，民國57。

⑤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民國十五年條下；《傅斯年全集》第七冊，台北，聯經，民國69。

於是就和戴傳賢與顧孟餘商量，聘傅斯年擔任這個職務。^⑥ 傅斯年到任以後馬上全力以赴，延聘有名的教授，並於次年秋天，創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同時創辦了《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以下稱《週刊》）。^⑦

傅斯年在籌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時，中山大學的語言歷史研究所已經成立。所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籌備，是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歷史語言研究所在籌備期間，與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不僅有相承，而且雙重的關係。朱家驊說：歷史語言研究所，自民國十七年春籌備之初，就由他（傅斯年）負責主持的。當時，他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長兼歷史系主任，他在系內已辦有語言歷史研究所，所以爲了方便起見，就在廣州籌備。名稱上把歷史兩字，改列語言之先，歷史語言合稱，是他根據德國洪堡爾德一派學者理論，經過詳細的考慮而決定的。^⑧ 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於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案《顧頡剛年譜》民國十七年十月條下說：

十四日，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次會議，二十一日，又赴會，并看該所新屋（東山恤孤院後街三十五號柏園）。二十二日，該所自中大備用的籌備處遷至新址，正式開辦。^⑨

⑥ 朱家驊，〈悼亡友傅孟真先生〉，《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 742。

⑦ 同上。

⑧ 朱家驊，〈紀念史語所故所長六十五歲誕辰序〉。

⑨ 王懋勤在其〈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的日期〉中，在考證各種說法後，最後據五十七年第二次所務會議決：「據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所人員議決，於十月二十二日遷入廣州柏園，爲所正式成立之日期。」《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四十週年特刊》，頁 200。顧頡剛曾參加該次會議，見顧潮編著，《顧頡剛先生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一九二八年條下，該條據顧頡剛是日日記，可補王文所謂史語所成立日期。

在十月二十二日以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籌備處，設在中山大學校區之內，與該校新成立的語言歷史研究所在設備、人員甚至經費方面都很難劃清。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入柏園才是正式成立之日，也是《集刊》創刊之時。《集刊》的第一本第一分同時在十月出刊，代表一個學術機構研究方向的同仁刊物，和這個學術機構同步誕生，也是國內學術機構少見的。

《集刊》所以能迅速創刊，完全得到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與《週刊》同仁的支援。傅斯年說：「這個歷史語言研究所，本是受大學院之委託在廣州的三人籌備。」^⑩所謂「在廣州的三人」，即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顧頡剛說：「十七年春，應中央研究院長蔡元培約，與傅斯年，楊振聲任歷史語言研究所常務籌備委員。」^⑪顧頡剛擔任常備籌備委員後，即著手起草「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大綱」，並編列該所預算表，以及《集刊》集稿和編輯工作。^⑫《集刊》伴隨著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而在廣州創刊，《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共一百一十七頁，除〈所務記載〉的〈造像徵集啓〉及〈本所對於語言學之範圍及旨趣〉外，《集刊》第一本的目錄計有：

〈發刊辭〉蔡元培，〈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本所籌備處，〈跋唐寫本切韻殘卷〉董作賓，〈建文遜國傳說的演變〉胡適，〈殷契亡丈說〉

⑩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廣州，民國17。

⑪ 顧潮，〈顧頡剛先生年譜〉，一九二八年，四月條下。

⑫ 同⑩，傅斯年謂由大學院委託在廣州的三人籌備歷史語言研究所，卻不舉三人姓氏，其中另有緣故。案傅氏之文成於該年五月，〈顧頡剛先生年譜〉一九二八年五月條下謂「後因與傅斯年意見相左，而不參加籌備事。」傅斯年與顧頡剛意見相左，見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第二十四冊，民國十八年八月二十日顧頡剛致胡適信中略言種切，該函亦收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傅斯年與顧頡剛兩位至友，至此竟交惡而不能再共事，以後竟成陌路人，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將另為文析論之。

丁山，〈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余永梁，〈占卜的源流〉容肇祖，
〈數名古誼〉丁山，〈周頌說附論魯南兩地詩書之來源〉傅斯年。

其中除蔡元培的〈發刊辭〉外，〈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由傅斯年親自執筆，以「本所籌備處」的名義發表。這篇文章在五月中已經定稿。因此，《集刊》的集稿與編輯工作在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之初，已由顧頡剛負責進行。他在三月二十五日寫信給胡適說：

孟真能讀書，能辦事，而不太上軌道……現在中央研究院要辦《集刊》，或可按住他的野性，作出一文。先生一文已收到，肯把這文放在中央研究院集刊嗎？^⑬

胡適的一文，就是第一本的〈建文遜國傳說的演變〉，至於傅斯年的那篇〈周頌說附論魯南兩地詩書之來源〉論文，則是被顧頡剛逼出來的。其他的論文則是當時中山大學國文、歷史系的同仁、或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員，董作賓就是在研究所負責民俗歌謠方面的編輯。

顧頡剛負責《集刊》的集稿與編輯工作，因為他是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的負責人。傅斯年接任中山大學文科主任後不久，就聘他的好友，當時因《古史辨》名滿學術界的顧頡剛，從廈門大學到廣州來。顧頡剛民國十六年四月到廣州，最初負責中山大學圖書館圖書採購工作。八月間顧頡剛從滬杭購書回到廣州，傅斯年已經開始籌備中山大學的語言歷史研究所，並任該所籌備主任。不過，在語言歷史研究所籌備期間，傅斯年在外奔走，語言歷史研究所的事務工作，則由顧頡剛負責。當時顧頡剛寫信給胡適說：

語言歷史研究所雖未成立，而已有房子、書籍、職員、出版物，同已

⑬ 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第二十四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

成立一樣。這方面孟真全不負責，以致我又有名無實當了研究所主任。^⑭

顧頡剛向胡適抱怨說當時他除了教書、編講義、上課、理書外，其他的零星工作就是編刊物、開會、接洽事務。他並且說「我自知無這方面的才具，不過在自己主管的範圍內肯負責的。」^⑮也就是向胡適說他並沒有辜負傅斯年所託。

在語言歷史研究所籌備期間，並準備出版包括《週刊》在內的各種刊物。十月十六日，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在傅斯年處開會，會議議決，由顧頡剛、余永梁、羅常培、商承祚編輯《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顧頡剛、楊振聲、杜定友等編輯《中山大學圖書館週刊》，鍾敬文、董作賓編《歌謠週刊》。^⑯

《週刊》於十一月一日創刊。從決定出版《週刊》，到《週刊》的出版，前後祇有半個月，時間的確是非常緊迫的。《週刊》的發刊辭說：

語言學和歷史學在中國開端甚早，中國所有的學問比較成績豐富的也推這兩樣。但為歷史上種種勢力所縛，經歷了兩千年不曾打好一個堅實的基礎。我們生當現在，既沒有功利的成見，知道一切學問，都不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習，不願把自己的理性屈服在前人的權威之下。所以我們正可承受現代研究學問的最適當的方法，來開闢這些方面的新世界。^⑰

這篇發刊辭雖然出自顧頡剛的手筆，但卻鮮明地表明了傅斯年的學術理

⑭ 同上。

⑮ 同上。

⑯ 《顧頡剛先生年譜》，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條下。

⑰ 《週刊》第一集第一期，廣州，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想和目標。發刊辭首先將語言和歷史結合起來，認為這兩種學問在中國開端甚早，並且留下豐富的成績，祇是經歷了兩千年沒有打下基礎。後來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進一步分析，認為語言和歷史在中國所以衰歇，因為題目已經固定，材料卻沒有擴充，工具也沒有添新。不過，在中國語言和歷史的材料卻是最多的。歐洲人對中國語言和歷史的研究起步很晚，對於這些材料求之難得，我們卻坐看這些材料毀壞亡失。傅斯年對於這種狀況著實不滿。更不服氣的是這種學問的材料，也被歐洲人搬走甚至偷去。所以，傅斯年想借用幾個不太陳的工具，處理些新獲見的材料，所以才有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設立。¹⁸

至於〈發刊辭〉所謂「我們生當現在，既沒有功利的成見，知道一切學問，都不是致用的。」後來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進一步分析，反對歷史語言的研究，不是「所謂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他認為中國希望製造一個新的將來，雖然取材於歐美的物質文明，但也要取精神於「未衰敗的外國」。歷史學和語言學的發達，自然和教育有相當關係，但卻不是什麼經國的大業，不朽的盛事，祇是些學院中的學院，願意將其一生消耗在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而已。¹⁹

傅斯年因「不滿意」具有悠久歷史傳統，而且頗有成績的中國歷史學和語言學式微，「不服氣」這些珍貴的學術資料，被歐洲人搬去或偷走，因而發憤創置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並且希望率領一批學者，終生從事這種無關經國大業又不生利的工作。〈週刊〉發刊辭首先將語言學和歷史學結合在一起，這種學問過去兩千年在中國已有豐富的成績，並強調歷史和語言學的研究不是為了致用的。這是傅斯年學術研究的理想和方向，也是當初創辦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的目的。後來傅斯年為《集刊》創刊而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事先已透過顧頡剛筆下的《週刊》發刊詞為他道

¹⁸ 同¹¹

¹⁹ 同¹¹。

出。所以，《集刊》的「工作之旨趣」，在《週刊》創刊之時，已雛形初具了。

當時一般說中山大學的語言歷史研究所，是仿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規模而設置，研究所《周刊》則採《國學門週刊》的形式。^①事實也是如此，顧頡剛曾任北京大學國學門的助教，並負責《國學門週刊》的編輯工作。而且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成立前後，出身北京大學國文系或國學門的商承祚、羅常培、容肇祖、董作賓、丁山先後由廈門大學轉入中山大學執教。^②到校以後並直接參加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工作。他們不僅參加所務會議，並且負責實際業務，顧頡剛、商承祚、羅常培負責《週刊》的編輯工作，容肇祖則是《民俗週刊》的審稿人，董作賓採集歌謠，並編輯《歌謠週刊》，^③成爲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與《週刊》的骨幹。

北京大學國學門下設有歌謠研究會、方言調查會、風俗調查會、考古學會。其中風俗調查會曾進行調查妙峰山風俗，並由國學門出版〈妙峰山進香專號〉。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成立後，仍繼續進行調查的工作，由容肇祖、商承祚到韶關調查古蹟及歷史遺蹟；俄國人類學者史祿國與生物系的任國榮到廣西實地調查獠人生活情況，後來由《週刊》編輯〈（廣西）獠人專號〉。^④所以，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不僅規模仿效北大國學門，最初的研究路線也是一脈相承的。商承祚、容肇祖等不僅參加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工作，

① 張蔭麟，〈評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論文〉，《週刊》第二集十九期。

② 據《容肇祖自傳》謂：一九二六年秋，北洋軍閥摧殘文化界，北京許多名教授相繼離京，魯迅、張星娘、沈兼士、顧頡剛等應廈門大學之聘到廈門。其後容肇祖、羅常培也相繼到廈門然後又轉來廣州中山大學，成爲語言歷史研究所與《週刊》的骨幹。

③ 《週刊》，第三集三十二期，〈本所紀事〉載該所第二次事務委員會議及第一次出版編審會議紀錄。

④ 《週刊》，第三集三十期載語言歷史研究事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該次會議五月十六日召開，又見《顧頡剛先生年譜》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條下。

並且是《週刊》主要的撰稿人。^{②④} 後來這些《週刊》的論文作者，又是《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創刊號論文的寫作者，如果沒有這批論文的直接的支援，《集刊》不可能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之日同時創刊的。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不僅與北京大學國學門一脈相承；而且中山大學的語言歷史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更是「同胞之姊妹」。歷史語言研究所北遷後，《週刊》報導〈語史界消息〉就說：

國立中央研究院之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本所關係非常密切，蓋不僅峙立南北，為國內僅有之研究歷史語言之機關，且此兩機關之產生，亦出於同幾位學者之擘畫，正不啻為同胞之姊妹也。^{②⑤}

傅斯年歸國後到廣州，前後一年的時間，先後創辦了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相繼發行了《週刊》和《集刊》，這兩個研究所在創辦之初，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如果沒有《週刊》的支援，《集刊》是不可能如期刊行的。

傅斯年剛出國留學的時候，初與歐美的新事物接觸，似乎會有些困惑。但卻沒有影響他內心的憧憬和追求的希望，當時曾寫下一首名為〈自然〉的詩，其中有「一點動機，散做無數動機，化為一團團的興趣，然後有了世界。」^{②⑥} 他回國後，就憑那一點動機，化為團團的興趣，在短短的時間內，相

②④ 容肇祖自《週刊》第一集第四期至一二一期先後發表〈韓非的著作考〉、〈青塚志（清胡風丹編）跋〉等論文十九篇，羅常培自第一集第六期至第四集第四十一期發表論文〈音韻學史序論〉、〈均韻探微〉等八篇，他們又是《集刊》最初的撰稿人。

②⑤ 《週刊》，第十一集一二二期。

②⑥ 《傅斯年全集》第七冊，詩前有致俞平伯，顧頡剛書，「以書為序」。書云：「我向來胸中的問題多，答案少。近二三年來，更蘊積和激出了許多問題。最近四五個月中，胸中的問題更大大加多，同時從前一切囫圇吞棗的，答案一齊推翻。」

繼創立了語言歷史與歷史語言兩個研究所，並刊行了對後來史學界影響很大的《集刊》，的確跨出他「為中國而豪外國」的學術理想第一步，^①不僅為他個人，同時也為中國現代學術與史學，拓墾出一個新世界。

二、〈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與〈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歷史語言研究所創立之初，規模仿效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集刊》的編輯形式，則是仿照國學門發行的《國學季刊》，一直延用至今。創刊於民國十二年一月的《國學季刊》，其編輯略例之一，即論文白話文言不拘，但一律用新式標點，用橫行寫印，並附英文提要。^②一本研究國學的刊物，卻以一種新姿態出現，編排的方式自左向右橫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標點符號，就當時的學術界而言，的確是一種革命。^③

由胡適起草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與傅斯年手撰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不僅是中國現代學術史重要的文獻，而且也是引導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的兩面旗幟。〈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說：

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研究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為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著這個大方向走。^④

^① 〈傅斯年致胡適書〉，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第三十七冊。

^② 〈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編輯略例〉，該編輯略例於十年三月廿一日《國學季刊》第一次編輯會議議決，見是日胡適日記。《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一冊，台北，遠流，民國75。又《胡適的日記》（香港，中華，1995），頁292。

^③ 《胡適口述自傳》，頁209，〈國學季刊發行宗旨〉，台北，傳記文學，民國72。

^④ 《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北京，十二年一月。後收入遠東編，《胡適文存》第二集，及遠流編，《胡適作品集》第二冊。

所以，《國學季刊》雖然是北大國學門的同人刊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對當時研究漢學或國學的原則和方法，作了一番簡要和廣泛的說明，不僅是北大同人在各方面努力和實驗的目標，同時也是新國學研究的綱領。更重要的是為當時「整理國故」的學術風氣樹立一個標竿。

所謂「整理國故」，是新文化運動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分析新文化的意義，胡適認為就是尼采所說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作一個新的評價。一個廣義的新文化運動應從三方面進行；一是研究當前社會、政治、宗教、文學、道德各種具體而實際的問題。二是輸入海外的新理論新觀念和新學說，幫助解決上述面臨的具體而實際的問題。三則是整理國故，也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作系統嚴肅的批評與改造。經過三方面的努力，必然產生第四方面的結果，那就是「再造文明」。^① 所以，通過嚴肅分析當時面臨的各現實問題，經過輸入新學理或新觀念幫助解決問題，同時以批判的態度，對傳統固有文明進行了解重建，最後就可以產生一個適合現代社會的新文明。^②

對傳統文化作系統批判與重建的「整理國故」，是新文化運動承前啓後的重要環節。清朝的漢學家所以能對國故學有重大的成就，因為他們所用的方法，無形中暗藏科學的方法。這種暗藏的科學方法是一種不自覺的科學方法。至於整理國故所用的方法，則是一種自覺的科學方法，並且更加上許多防弊的方法，其成績一定超越前代。^③ 至於這種所謂的「自覺的科學方法」，具體地表現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之中。

所謂「國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過去的文化歷史都屬於國故的範疇。國故這個名詞是中立並不含褒貶意義。國學研究

①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作品集》第二冊。（台北，遠流，1988）頁41。

② 拙作，《清算胡適的幽靈》，《且做神州袖手人》（台北，允晨，民國78），頁153。

③ 胡適，《論國故學——答毛子水》。許嘯天編輯，《國故學討論集》上（上海，群學社，16年1月），頁131。

的範圍包括過去三四千年的文化。因此必須以歷史的眼光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國故學既然包括過去的歷史文化，但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的興亡固然不是歷史，過去的種種上至思想學術之大，下至隻字或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於國學研究的範圍。^④

雖然，國學研究的範圍包括過去數千年的歷史文化，國學研究的目的，在整理過去的一切歷史與文化。但〈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所討論的，卻集於清朝近三百年的學術思想，認為這是一個古學的復興時期。總結這個時期的成績，一是對古籍的整理，二是訓詁，也就是用合乎科學的歸納法，找出古辭、古字的原始意義，三是逐漸發展而形成的校勘學，以確定古籍的真偽。經過許多大師以版本、訓詁、校勘方法，對古籍作系統的整理，許多經書與古籍已較過去易讀。此外還有古籍的翻刊與古物的發現。三百年來第一流的學者思想精力都集中在這方面。他們對古學所作系統整理的努力與貢獻，是值得肯定的。^⑤

不過，三百年古學研究的焦點，祇集中在幾部儒家的經書上，脫不了儒書一尊的成見，而且清儒鑒於宋儒專靠理解的危險，所以努力避免主觀的見解。所以，三百年來祇有經師沒有思想家，祇有校書者沒有史學家。而且他們的努力對社會生活，幾乎全不發生影響。所以，過去三百年的學術，過於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由於缺乏比較的材料，研究的範圍過於狹小，祇在幾部儒家的經典中打轉，始終脫不了個陋字。^⑥

針對過去的缺失，〈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提出今後國學研究的方向，認為對國學的研究僅靠材料的積聚是不夠的，還須對材料有系統的整理。關於對材料的整理，應分別以索引式、結帳式、專史式的整理方式進行。因為沒有經過整理的材料，不僅沒有條理而且不易檢尋。若要增加學術進步的速度，減少學者精力的耗費，就是將一切大部或不易檢查的書，編成索引，便於人

^④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⑤ 同上。

^⑥ 同上。

人能用古書。另一方面，一種學問到了一個時期，有總結帳的必要。學術上的結帳功用分兩方面，其一是將一種不成問題的學術部分，整理出來，交給社會，二是將不能解決的問題提出來，引起學者的注意。所謂結帳，就是總結以往的成績，作為未來研究的新方向。索引式的整理，是要古書人人能用，結帳式的整理是要古書人人能讀。然後以此為基礎，進行專史式的整理，也就是有系統的研究中國歷史文化。最後，並且提出國學研究的三個努力目標，即一，用歷史的眼光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二，用系統整理部分國學研究的材料；三，用比較的研究幫助國學材料的理解 and 解釋。

這篇〈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於十一月五日夜間開始起草，至十一月九日定稿。胡適說他作文章「算這篇最慢了」，他十一月五日的日記說：

作《國學季刊》序言，約萬餘字，頗費週折。這是代表全體的，不由我自由說話，故下筆頗費思量，我作文算這篇最慢了。

這篇〈宣言〉所以寫得緩慢，由於代表全體，他個人不能自由發表個人意見，所以下筆頗費思量。這年三月，北京大學決定停辦《北大月刊》。因為研究所的成立，準備分別創辦《文藝》、《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四個季刊，《國學季刊》由胡適負責籌辦。^⑦三月十一日召開《國學季刊》第一次編輯會議，由國文系教授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國文系教授周作人、劉文典、馬裕藻、錢玄同、鄭奠，史學系主任朱希祖，經濟系主任顧孟餘，經濟系教授李大釗，哲學系教授單不庵，英文系主任胡適等組成編輯委員會，^⑧

^⑦ 《胡適的日記》，民國十一年三月十六日條。

^⑧ 《國學季刊》各編輯委員的教職。見《國立北京大學廿週年紀念冊》第二冊載〈現任職員錄〉，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六十年。又朱倏〈五四運動前後的北京大學〉收入《文化史料叢刊》第五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

並舉即將出任教務長的胡適任編委員會主席，起草《國學季刊》發刊辭。^③

代表研究所國學門的《國學季刊》，其編委以國文系並兼任國學門的教授為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於民國九年成立。研究所國學門成立的目的，《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成立章程》（下稱〈國學門成立章程〉）說，為「歐美各國新發明之學術，率由其傳統之學術闡揚而來。則闡揚吾國固有之學術，以期有所發明。」^④

〈國學門成立章程〉並且說，「近年歐美學者已悄悄移其注意於我國固有之學術」，但我國固有學術「率有混沌紊亂景象。六經諸子書傳之久矣。數千年間，人自為解，莫不以為真能發六藝諸祕。」而至乾嘉諸老出，「古學略有條理，系統乃可得。」然而「乾嘉諸老能治名物訓詁之間，而義理之途未闢者甚多也。」認為「今日闡揚之學術，其道尤要於整理。」過去「乾嘉諸老能以數千年渾沌紊亂之學術稍作整理，使有條理系統可言，頗有近代科學之法。惜未獲科學之法，故其成績僅至此而止。」^⑤因此，現在對國學研究，應「取乾嘉諸老之成法，而益科學之方法，更得科學之輔助。」國學研究的途徑，則「既須繼乾嘉諸老之所未竟，又須治乾嘉諸老所未及」，^⑥所以整理固有學術之道，宜分兩方面進行，一為整理學術，「整理學術者，將古人學說以科學方法分析之，使有明白之疆界，純一之系統，而後得見古人之面目，無渾沌紊亂之弊。」二為整理學術之材料，「整理學術，必先整理其材料，吾國古籍不為不富，就學術各方面而分類整理之。」^⑦

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固有的學術文化，是當時學術界流行的趨向，北京大

③ 沈尹默，〈我和北大〉一文中說：「評議會成立後，提出設立教務長，胡適毛遂自薦，要做教務長。」案《胡適的日記》民國十一年四月一日，任教務長。又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學日刊》載北京大學布告稱「教務長胡適因病請假」。

④ 民國九年十月十九日，《北京大學日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學國學門順應這個潮流而立。所以，〈國學門成立章程〉所提出的以科學的方法對固有的學術作系統的分析，使渾沌紊亂的固有學術有「明白之疆界」，及對學術材料作分類的整理，和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在某種程度上是相近的。胡適認為「整理國故」的目的就是在紊亂的傳統學術中，理出一個條理和脈絡，並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之後，重新肯定真正的價值。^④不過，〈國學門成立章程〉所提出的對固有學術作系統的分析，予以明確的界定，以及對學術資料作分類的整理，祇是胡適整理國故的過程，不是最終的目的。雖然，胡適認為調和是懶人懦夫的行徑，^⑤但胡適起草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似乎有某種程度的調和成份。〈國學門成立章程〉可能出自後來擔任國學門主任的沈兼士之手。^⑥沈兼士和國學門部分成員多是留學日本，或出自章太炎門下，對胡適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即使不反對也採保留態度，^⑦所以，胡適起草〈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不僅以〈國學門成立章程〉為藍本，並且對他們作某種程度的妥協，所以他在〈宣言〉最後說：

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我們此時正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補救我們沒有理論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法開的新法門，可供給我們添無數借鑑的鏡。

④ 同③。

⑤ 同上。

⑥ 研究所國學門即由沈兼士任主任，〈籌畫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經費建議書〉即由其起草，收入《沈兼士學術論文集》，頁362。〈國學門成立章程〉或出自他的手筆。

⑦ 沈尹默，〈我和北大〉說章氏門下可分為三派，一是守舊派，代表人是嫡傳弟子黃侃，這一批的特點是，凡舊皆以為然。二是開新派，代表人是錢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稱疑古玄同，其意可知。三是中間派，以馬裕藻為代表，依違兩派之間，胡適在北大國學門所遇見的學者多為開新派，他們都留學日本。

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大的轉變，就是對西方文化的吸收，由歐美直接輸入，代替以往由日本轉口的輸入。^④ 作為新文化運動領導者胡適，在談到輸入學理，絕少將歐美和日本相提並論的，而且上述方法和材料的論據，正是〈國學門成立章程〉所提的整理固有學術兩條途徑的闡釋。後來胡適到南京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演講，講的題目是〈再談談整理國故〉，一開始就說：「行篋無書，只得將整理國故的方法，和在北京諸同志對於整理國故的意見報告。」並且說：

現在一般朋友，在北京提辦一個國學研究所，用新的方法，事半功倍的去收實效，而在大學內，尤其應該提倡的。「國故」兩個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從前用的國粹好多了；其意義即中國過去的歷史、文化史包括一切。^⑤

這次的演講，已與從前所講〈研究國故的方法〉，提出以歷史的觀念，系統的研究與整理，已有所不同。^⑥ 講的內容完全是根據他起草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所謂「國學研究所」，即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至於「一般朋友」

-
- ④ 拙作，〈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心路歷程〉，收入《史學危機的呼聲》，台北，聯經，民國76。
- ⑤ 許嘯天編，《國故學討論》上，此篇講詞《胡適文存》與《胡適的作品》未收。
- ⑥ 胡適的〈研究國故的方法〉，是他民國十年在南京東南大學的演講詞，由沈薪記錄，原刊於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出版的《東方雜誌》，後收入《國學叢刊》第一卷一期，及二十六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我們怎樣讀書》，現收入台北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的《胡適作品集》第二十四冊。〈再談談國故整理〉則是民國十二年請假在上海養病，再去南京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演講，此時《國學季刊》一卷一期已出版，胡適演講全取〈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內容與前次所講〈研究國故的方法〉完全不同。

即《國學季刊》的編委會的成員。所以胡適在他的日記中說他起草的《國學季刊》序言，「是代表全體的，不能由我自由說話。」因此，「下筆頗費思量」不是沒有原因的。

雖然，《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是一篇妥協後的文章，胡適不能暢所欲言，但卻也將其個人一部份理念融於其中。因此，後來胡適借此作為他倡導整理國故成果的實踐。⁵¹不過，但由於《國學門成立章程》的整理渾沌紊亂的固有學術，使之有一明白之疆界，及對學術材料分類的整理的局限。雖然《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認為學術的進步分對材料的聚積與剖解，與對材料的貫通兩方面進行。但事實上其所宣佈的研究方向，祇是透過對傳統學術作索引式、結帳式及專史式的整理，最後得以用歷史的眼光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系統的整理部勒國學研究的材料；用比較的幫助國學材料的整理和解釋。⁵²凡此種種，國學研究還停留在材料的整理階段，並沒有進入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另一方面，國學研究包括過去的一切歷史文化，理想的國學研究系統包括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制度史在內的中國文化史。⁵³所以《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說，國學研究也就是進行有系統的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因此，國學研究者就是歷史學家。作為一個史學家須有兩種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沒有精密的能力不能做搜集和批判材料，沒有高遠的想像不能構造歷史的系統。⁵⁴

所以，《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某種程度說是一篇史學宣言，透過對材料的

⁵¹ 《胡適口述自傳》頁 216 說：「我自己如今回想一下，我在這全部工作的努力，固然不很成功。但在某些方面我也做了些事。」胡適將《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以專章敘述，似有意以「北京諸同志對於國學整理的意見」，作為他個人推行「整理國故」的實踐成果。

⁵²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⁵³ 同上。

⁵⁴ 同上。

系統整理，引導中國史學由傳統向現代過渡。所謂由傳統向現代過渡，僅停留在對材料系統的整理，並沒有進一步形成一個研究的體系。後來傅斯年在《集刊》創刊，發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認為史學這門學問就是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才有四方發展，向上增高的空間。⁵⁵不僅系統地整理材料，並且進一步佔有材料與應用材料，建立一支中國現代史學研究的隊伍，引導中國史學跨越傳統正式邁入現代。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和〈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相較，傅斯年基本上反對「國學」這個觀念。他認為過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中國的東西，而且對這些材料過去已有了些研究，以後研究堆積起來比較方便些。但世界中無論那一種歷史或語言學，要想做些科學的研究，祇有用同一種方法。所以這些學問決不是以國別或邏輯的區分，不過是因地域方便的分工。國故本來是國粹，而所謂國學祇是一種改良的存古學，而「國學」或「中國學」等名詞，說來都不甚吉祥，西洋人已造了支那學或「新諾邏輯」的名詞。⁵⁶如果中國還有將來，這個名詞就不甚通達。就所謂國學在歷史語言的範圍而論，為了追求這些題目的解決與推進，就擴充材料與工具而言，勢必弄得不故了。這並不是名詞的爭執，而是精神差異的表現。⁵⁷

所謂精神表現的差異。雖然，胡適認為國學或史學的方法是科學，但就本質而言，國學或史學屬於人文學科的範疇。不過，傅斯年卻認為歷史學不是著史。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提供的一切工具，整理一

⁵⁵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廣州，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後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冊。

⁵⁶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後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冊。

⁵⁷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工作之旨趣〉一文，與其發表於民國八年五月一日《新潮》一卷五期的〈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識語」〉文中所謂：「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方法，決不是抱守殘闕的人所能辦得到的，研究國故好像和輸入新知立於對峙的地位，其實兩件事的範圍，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已完全不同，該文收入《全集》第四冊。

切可遇的材料，自地質學以至目下的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進化論就是歷史方法之大成。⁵⁸ 也就是說不僅史學方法是科學的，史學本身也是科學的一支。將人文學科中的某些科目視為科學，在傅斯年出國留學之前，就有這樣的認知。傅斯年就讀北大時，致校長蔡元培〈論哲學門屬於文科之流弊說〉說：

今文科統括三門，曰哲學，曰文學，曰史學。文史兩途，性質固不齊一，史為科學，文為藝術。今世有以科學方法，研治文學原理者，然是不過文學之一面，其主體為藝術，不為科學也。為文學之一部，而中國「文史」一稱，相習沿用已久，循名責實，文史二門，不宜必分也。反觀哲學，於文學絕少聯絡，不可以文史合科之例衡之。文學與哲學合為一門，於文學無害也，而於哲學則不當，哲學主知，文學主情，哲學於各種問題恆求解決，文學則恆以不解解之，哲學於理分析毫釐，文學則獨以感情為重，其本異，其途殊。今因不可謂文學哲學渺不相干，然哲學所取資文學者，較之取資科學者，因不及什一也。……今學生主張哲學應歸入理科，不僅按名求實，以為哲學不應被文學之名也。……若就教授之聯絡而言，哲學門尤宜入之理科。物理門之理論物理，化學門之理論化學，數學門之天文學，聚數論，微積分，動植物門之生物學，人類學，皆與哲學有親切之關係。在於西洋凡欲治哲學者，其算學知識，必須甚高，其自然科學知識，必具大慨，吾校之哲學門，乃輕其所重，絕不與理科諸門謀教授之聯絡，所未喻也。⁵⁹

傅斯年在這封信中，雖然認為史學是科學，但由於長久以來文學和史學「相

⁵⁸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⁵⁹ 民國七年十月八日，〈北京大學日刊〉，該文《全集》未收，但卻是傅斯年將史學視為科學最早的發端。

用至殷」，中國自來文史並稱，相習沿用已久，文史二門暫不宜必分。至於哲學則不然，哲學與文學的關係遠，與科學卻有親切的關係，哲學屬於科學的範疇，應劃歸理科。蔡元培覆函說：「治學者不能不根據科學，即文學史學莫不然，不特文學史學近皆用科學的研究法也。文學必根據心理學及美學等。今實驗之心理學及實驗之美學，皆可屬於理科者也。史學必根據于地質學、地文學、人類學等，如哲學可入理科，則文史亦然。如以理科之名，足為理科之代表，不足以包文學，則哲學之玄學，亦決非理科所能包也。至於分設文哲理三科，則彼綜錯之處更多。以上兩法似皆不如破除文理兩科之界限，而合組大學本科為適當也。」^④ 傅斯年對蔡元培的覆函深為不滿，後來到英國寫信給胡適說：

近中溫習化學、物理學、數學等，興味很濃，回信在大學時，日誤於預科，卻再誤於文科國文門，言之可嘆。^⑤

所以，傅斯年初到英國研習心理學，並且對胡適說：

下學年所習科目半在理科半在醫科，此年之中對於求學計劃，比前所定又稍有變更，總之年限增長，範圍縮小。哲學諸科概不曾選習，我想若不於自然或社會科學有一二種知道個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學哲學定無根基。^⑥

傅斯年為實現他哲學應劃歸理科的理想，出國後就投身於理科的研習，後來討論傅斯年的思想，都說他對科學的認知，受國外思潮的影響。但從以上資

④ 同上。

⑤ 《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第三十七冊。

⑥ 同上。

料可以了解，如果說傅斯年的科學精神援之於外，^⑤ 不如說蘊之於內更恰當些。經過八年海外的潛沉，歸國後終於以這種理想，創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說：「中央研究院設置之意義，本為發達近代科學，非為提倡所謂固有學術。故如以歷史語言之學承固有之遺訓方不欲新工具，益其觀念，偶成與各自然科學同列之事業，即不應于中央研究院中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使之與天文、地質、物理、化學同論，今者決設置。下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即立意將歷史語言劃入科學的範疇。^⑥

所以傅斯年認為史學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作疏通的事業，不去扶持或推倒這運動，或那個主義。〈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即以此為基礎展開。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認為雖然歷史學與語言學在中國，已經有了很好的開端，但發展至今卻落後，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凡是一種學術研究能運用直接材料的，就可以促使這種研究進步。運用直接材料是一種科學研究。在科學研究中的題目是事實的匯集，由於對事實的研究而產生新的題目。新的事實證明舊的問題已不成問題，自然失去其原來問題的價值。但卻解決由事實引發的問題，而促使這類學術的發展與進步。其次，一種學術必須擴充其研究的材料。^⑦ 因此，作學問不是去讀書，而是動手動腳找材料，隨時擴大材料的範圍。因為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成了各種科學方法的匯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都是提供歷史研究的工具。^⑧ 沒有客觀處理歷史語言研究的精神，就不會感覺擴充材料工具的必要，這是中

⑤ 岳玉璽、李泉、馬亮寬，《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天津，人民，1994。張利庠，〈論傅斯年的史學貢獻及其史學理論和方法〉，收入《史學理論叢書》，編輯部編，《當代西方史學思想的困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以及張學書，〈顧頡剛傅斯年治史異同論〉，《歷史學》，1994，5。以及王戎笙，〈論傅斯年〉等，似持此論。

⑥ 〈中央研究院民國十七年年度報告〉。

⑦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⑧ 同上。

國近代歷史，語言學衰落的原因。所以，應用直接材料擴充材料範圍與研究應用的工具，是現代歷史語言學發展的新方向。

應用直接的材料，將材料整理妥當，則事實就自然明顯了。所謂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貨，沒有材料就不出貨。^⑶ 透過材料將兩件事實聯繫起來，其間仍有距離的空間，但對這個空間可以涉想，但卻不能推論。^⑷ 因為把主觀的假設視為當然，是非常危險的事，因此，存而不備，證而不疏，是處理材料的態度和手段。也就是在材料之內使其發現無遺，材料之外則不超越，至於對材料的疏通與普及，則不是歷史語言研究份內事。^⑸ 和胡適起草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相較，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已超越對固有學術系統整理的階段，直接應用材料進行研究，透過材料「存而不補，證而不疏」的客觀處理，將歷史語言學建設得如生物地質學一樣，最後將科學的東方學的正統，在中國樹立起來。^⑹

如果說〈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引導中國史學由傳統向現代過渡。〈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則是一面中國史學跨越傳統，邁入現代的旗幟，由於廣州地處當時學術中心的邊陲之地，而且傅斯年去國八年沒有捲入學術是非的漩渦，他可以毫無掛慮地突破「整理國故」籬藩，拓創中國史學的新境界。不過，在語言歷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初草創之時，希望藉胡適當時的聲望，南下廣州助他們一臂之力，^⑺ 可是胡適不僅沒有去，並且對傅斯年創立的兩個研究所，戲稱「狡兔二窟」，傅斯年於此甚為梗梗。寫信給胡適說：

⑶ 同上。

⑷ 同上。

⑸ 同上。

⑹ 同上。

⑺ 傅斯年在廣州創辦兩個研究所時，最初和顧頡剛殷切盼望胡適南下廣州，傅斯年寫信給胡適說「若干事惟先生不能舉，領導事非先生不能為，必有來此，以成此事。」顧頡剛寫信給胡適，說他們已訓練學生聽講國語，以方便胡適來後的溝通。當時胡適遊歐美歸來後，在上海主持中國公學，傅斯年亦因公幹到上海，但胡適當時日記，對傅斯年創辦研究所事隻字未提，頗堪玩味。

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業已籌備，決非先生戲稱謂狡兔二窟，實斯年等實現理想之奮鬥。為中國而豪外國，必是勉奮以赴之。現在不吹，兩年後必有可觀也。^⑦

兩年後，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北平，隨著《集刊》第一本二、三、四分的出版，傅斯年創辦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又進入另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與《六同別錄》

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說：「稍過些時，北伐定功，攻虜收京。這個研究所的所在，或一部分在廣州，一部分在北京。」後來他的想法實現了。語言歷史研究所留在廣州的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北平。

民國十八年三月，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遷往北平，六月遷入北海公園的靜心齋。將原先準備籌設的八組合併為三組，第一組歷史學，第二組語言學，第三組考古及人類學。分別由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為主任。《集刊》繼續在北平出版。

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北平後，《集刊》第一本第二、三、四分，第二本一、二分先後出版，共載論文三十八篇，作者二十六人。這些作者有隨歷史語言研究所由廣州遷來的丁山、羅常培、史祿國（S. M. Shiro Kogoroff，俄國人類學家）、董作賓；有北京大學的劉復、朱希祖、朱倓父子、陳垣、林語堂、王靜如；以及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陳寅恪、趙元任等。他們後來分別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專任、特約或通訊研究員。傅斯年說：

民國六至十五年間，北京有了兩個漢學研究所。一是北大，態度極向

^⑦ 《胡適遺稿與祕藏書信》第三十七冊。

新方向走，風氣為胡適之等所表率，惜在其中工作者，或未能以為專業，後來因政治情形工作停頓。又有清華研究院，此院以王靜安之力，頗成一種質實而不簡陋，守舊而不固執的學風，惜又不久停頓。凡此種種，皆是甚好之萌芽。^⑬

在北平出版的《集刊》作者，分別來自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或清華國學研究院，即使隨歷史語言研究所北上的論文撰述者，也是出身北大或北大國學門。傅斯年所謂北大國學門「後來因政治情形工作停頓」，那時北京大學由於政府的財政收入始終未能改善，實在非常困難，實際的情形是國家政局在動盪之中，北方軍閥混戰不已，教學和研究無法進行，教授紛紛離開北京，南下另謀生計。^⑭

至於清華學校的國學研究院，在北京國立八校經濟拮据之時，祇有清華學校經費獨立不受影響。校長曹雲祥於民國十三年秋，計劃改制，設立大學各學系及國學研究院，並請胡適代為設計國學研究院。胡適略仿昔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籌設國學研究院，十四年春，聘請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為導師，李濟為講師。校方擬請王國維主持院務，王國維堅辭，另聘吳宓為主任。^⑮八月開學。清華國學研究所開辦，在當時教育界是件創舉。國學研究院的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清華國學研究院在當時北方學術界非常活躍，以近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得到社會熱烈的支持。^⑯民國十六年夏，北方局勢不穩，六月二日，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研究院同學如山

^⑬ 〈傅故所長孟真先生手蹟釋文〉，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特刊》，頁205。

^⑭ 《胡適口述自傳》，頁215。

^⑮ 藍文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原載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台北出版的《清華校友通訊》新三十二期，收入俞大維等著，《談陳寅恪》，台北，傳記文學，民國59。

^⑯ 同上。

頽木壞。此後，梁啓超辭職回天津養病，吳宓回任外文系，清華國學研究院至十八年夏天，遂告結束。^⑦

北大國學門與清華國學研究院是當時學術界，領導整理國故的兩個機構，然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北平時，已形同虛設了。傅斯年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恰好接收了兩個研究所累積的成果，不僅擴充了《集刊》的稿源，同時也充實了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人員。更重要的是清華國學院的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也加入歷史語言研究所，分別主持歷史、語言、考古的研究工作，他們留學歐美，對中國學術未來的發展，與傅斯年有相同的理念。他們的結合象徵中國學術已經超越「整理國故」，由傳統向現代的過渡階段，正式進入現代學術研究領域。

陳寅恪與傅斯年同在德國留學，他們在當時的留學生中，潛心向學，心無旁騖，被稱為「寧國府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是最乾淨的」。^⑧ 傅斯年對陳寅恪的學養更是欽佩。傅斯年在廣州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時，陳寅恪已回國在清華執教。因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準備北遷，先在北平成立分所，其後聘請陳寅恪任分所主任。^⑨ 至於李濟的參加，《顧頡剛先生年譜》十七年十一月條下說：「到中研院史語所，歡迎李濟、趙元任。伴彼等參觀史語所。」當時李濟並不認識傅斯年，他從歐洲回國，路經香港，順便到廣州新成立的中山大學看看，遇到他的朋友莊澤宣。莊澤宣說剛好傅斯年想找他。李濟說見了傅斯年，跟他談的是辦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事。並且要他擔任田野考古的工作，因為傅斯年要從事新式的田野考古工作，已經派董作賓到河南從事殷墟的試掘。^⑩ 這時趙元任夫婦正在廣州旅行，勸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北平比較

⑦ 同上。

⑧ 楊步偉，《雜記趙家》（台北，傳記文學，民國 61），頁 29。

⑨ 王懋勤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事表〉，民國十七年條下。

⑩ 李濟，〈傅斯年創辦史語所與支持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傳記文學》28 卷一期。

好，傅斯年請趙元任回北平先辦語言所，歷史等他到後再說。^①李濟說「我感到陳寅恪和趙元任先生都已答應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分別主持歷史組和語言組，現在要我來主持考古組，地位和他們相等，而我年紀比較輕，這使我感到非常榮幸。」^②自此，李濟、趙元任、陳寅恪與傅斯年結合成志同道合終身不渝的工作伙伴。

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參加歷史語言研究所，建立起該所的研究架構與方向。傅斯年雖然接收了北大國學門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累積的成果，但他認為這些成果祇是「甚好之萌芽」。仍有許多問題存在，所以他說：

尤其北大所領導對付「國故」之新的態度，為最有潛力者。然而工作多是零碎的，而其成績總是個人的，一時的，在組織上未能應付已熟之時機也。自民國十五六年以來，有一派少年文史學者，頗思大規模的新方向走，以為文史之發展，決非個人單獨的工作，或講學的風氣，所能濟事，必須有一廣大精嚴的組織，方可收大效力。^③

傅斯年認為現代的研究工作，已不是個人單獨的零碎工作，必須有一個廣大嚴密的組織，才能收其成效。所以在傅斯年創立歷史語言研究所時，即有此構想，〈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說：

歷史語言學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容易由一個人作獨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圖書館或學會供給他的材料，靠團體為尋材料，並且須得在一個研究的環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於是乎孤立製作漸漸的難，漸漸的無意味，集眾的工作漸漸的成一切工作的樣式了。

① 楊步偉，〈雜記趙家〉，頁64。

② 同①。

③ 同⑦。

傅斯年已經創造了一個研究環境，現在進一步準備組織一支「集衆」的研究隊伍，吸收「一派少年文史學者」參加。於是，傅斯年、董作賓、李濟、梁思永等都到北大兼課，想在講課中選拔人材。後來北大的畢業生如胡宣厚、張政烺、傅樂煥、王崇武、勞榘等都進入歷史語言研究所^④。其中勞榘前後經歷了研究所九遷中的八遷，成爲傅斯年栽培「集衆」研究部隊中重要的骨幹。

勞榘在北大歷史系就讀時，曾修習傅斯年的史學方法論。傅斯年看過他的試卷後，要他畢業後到史語所去。勞榘說：「但因史語所待遇較低，而我有母親需要照顧。畢業後就到濟南教了一年書，又到曹州教了半年書，民國二十一年冬天，才回到研究所。從那時起，我雖曾赴美，但與史語所一直保持親密的關係。」^⑤ 勞榘又說：「我初入研究所時，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並未合作創辦，史語所有意辦普通的研究所，稱爲研究生。半年之後，傅先生改變了辦普通研究所的想法，把我調到南京社會研究所，做了一年助理研究員，後來又回到史語所來。」^⑥ 勞榘是傅斯年培養研究隊伍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勞榘抗戰期間在李莊寫給胡適說：

學生自從抗戰以後，隨歷史語言研究所從長沙到昆明，再到李莊，已很多年沒有見到先生了……《居延漢簡考釋》，已致函重慶請孟真先生託便人帶美，此書印刷太壞，工人錯誤百出，而且當時恐篇幅太大，釋意太簡，未能盡量發揮。^⑦

④ 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收入椰城師範學院編，《傅斯年》，濟南，山東人民，1991。

⑤ 邢義田，〈勞榘教授訪問記〉，《漢學研究通訊》，第二卷第二期，民國72年4月。

⑥ 同上。

⑦ 〈胡適遺稿與祕藏書信〉第三十六冊。

當時在李莊，是歷史語言研究所最艱困的時期，勞榦卻完成了他的《居延漢簡考釋》。同時歷史語言研究所又出版了《六同別錄》與《史學與史料》。

六同，是蕭梁時代的郡名，其郡治似即在當時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在地——四川南溪縣李莊鎮，或相去不遠。⁸⁸ 抗戰軍興，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在動亂中遷播，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上海戰雲密布，中央研究院決定西遷。八月，歷史語言研究所遷抵長沙，分別駐入韭菜園的聖經學校，及南嶽的聖經學校。當是時，烽煙四起，前途茫茫，所中的部份人員，四下奔散。⁸⁹ 二十七年一月，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員及眷屬，以及圖書和設備，一部份經貴州赴昆明，一部份取道廣西至桂林，然而再轉道越南赴昆明。先選定拓明東路與青雲街三號為所址，後因日機空襲，再遷至市郊的龍泉鎮的響應寺及龍頭書場。後因滇邊軍事吃緊，歷史語言研究所準備再遷四川。因昆明常有敵機轟炸。傅斯年決定歷史語言研究所再遷，一定遷到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⁹⁰ 於是派芮逸夫赴四川尋覓適當所址，最後選定四川南溪縣李莊板栗坳的張家大屋。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李莊，途中歷經艱辛，終於暫時定下來，至抗戰勝利復員還都，前後五年。

從重慶去李莊先乘船到宜賓，然後再轉船順流而下到李莊。李莊是個約有萬人的小市鎮，有條石板大街，座落在約半英里寬的平原上。地勢高亢，可避免洪水的泛濫。這裡可以看到長江的風光，一條綿延不斷的河谷，兩邊夾峙著高約二百至四百英尺的小山。還有一條狹窄的沿江平原，平原上都是精耕細作的田地。從一邊望去，可以看到寧靜的台地，並看到兩岸間約有四

⁸⁸ 傅斯年，〈《六同別錄》編輯者告白〉，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三種，李莊，民國三十四年，收入《全集》第三冊。

⁸⁹ 石璋如，〈照林與侯家莊 1001 大墓〉，《中國歷史博物館刊》1995 年第一期，附錄石著〈劉照林先生的考古工作〉中的〈清溪閣醉別〉一節，記載考古組同仁在長沙清溪閣的離別宴，宴罷，有家可歸家，或自行離去，願隨所西遷者則留所，一桌盡醉，其情甚悲壯，其中劉耀則赴延安，後易名尹達。

⁹⁰ 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

分之一里的清澄碧波從圖畫中流瀉而出。^④ 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在地板栗坳的何家大屋，分為三區，一是田邊上，是圖書及二、四組的所在地，一是牌坊頭，即三組的所在地，三是新房子，新房子又稱茶花院，是第一組的工作所在。茶花院有茶花兩株，其樹齡已不可知，整個院子都在兩株茶花覆蔭之下。花期自頭一年十一月起至次年三月止，歷時五月。茶花在諸花中，花期是較長的一種。花期繁盛，每當花季，落花滿地。^⑤ 這是當時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研究與生活的地方。

當時傅斯年因公事的關係常在重慶，所務先由董作賓代理。除李方桂、董作賓外，在所的人員有向達、丁樹聲、岑仲勉、張政烺、王崇武、陳槃、勞榘、石璋如、董同龢、高去尋、凌純聲、芮逸夫、全漢昇、楊時逢、李光濤，以及寄寓的王獻堂、屈萬里。^⑥ 此外，還有北京大學的文科研究所。北大、清華、南開組成西南聯大後，合辦本科，研究所則由各校分別辦理，北大恢復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代理主任，^⑦ 後來一部分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李莊，設立北大文科研究所辦事處，由鄧廣銘負責。^⑧ 研究所的學生有王明、任繼愈、馬學良、劉念和、遂欽立、胡慶鈞、王叔岷、李孝定、王利器等，^⑨ 後來其中部分研究生畢業後便留所工作。

當時的生活是非常艱困的。整個何家大屋，祇有一盞煤油燈，是傅斯年從重慶帶給董作賓的。其他人點的都是桐油燈，他們在桐油燈下熬夜不懈，

^④ 陸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其中第十九節〈學術研究中心與美國利益〉，費氏回憶其自重慶訪問李莊的經歷。

^⑤ 李光濤注董作賓《春樟集》，《董作賓逝世三週年紀念集》（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55），頁54。

^⑥ 王利器，〈六同求學前後——回憶導師傅孟真先生〉，收入《傅斯年》頁12。

^⑦ 牛大勇，〈北京大學史學系沿革紀略（一）〉，《北大史學》，北京，1993。

^⑧ 同^⑦。

^⑨ 同^⑧。

一個個的鼻孔如煙囪。^⑦那時抗戰已進入最艱苦的階段。物質條件到了不可忍堪的階段，但他們卻個個努力不懈，傅斯年所謂「集衆」的研究隊伍就是在这艱苦時期養成。他們的研究成果，具體地展現在《六同別集》與《史學與史料》上。

抗戰爆發以後，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出版品遭遇到困難。傅斯年在〈本所刊物淪陷港滬情形及今後出版計劃〉中說，歷史語言研究所各項刊物，原來自刊自售，於民國二十三年六月，改委託商務印書館出版。抗戰以後，情勢轉變，然內地無法精印，兼以印刷費有限，迫不得已仍委託商務印書館辦理，但三四年來，印刷遲緩，而且自太平洋情勢緊張，歷史語言研究所交付商務印書館的稿件或已印成的書刊全部不知下落。^⑧所淪陷的書刊，凡二十一種，總計在三百萬字以上。其中《集刊》九本一分至十本二分均淪陷於上海。其出版與否均不得而知，於是將九本一分暫行空出，待抗戰以後，查明情形，調整補印。並且將若干單篇論文，輯為《集刊》外編，油印出版，因此而有《六同別集》與《史學與史料》的出版。

〈《六同別錄》編輯者告白〉說：「我們的刊物關於語言學者，需要用國際音標，其他的又需要大量銅版、鋅版、刻字、線表、照像影印等，我們沒有錢……目下祇好就李莊營業的小石印館，選些需要刻字、音標，而不需要圖版的湊成這一本，用石印印出。其他需要照像影印的，仍然沒有辦法。」^⑨《六同別錄》後來作《集刊》第十三本及十四本，作者則有石璋如、周法高、張政烺、李濟、董作賓、屈萬里、勞榘、遼欽立、高去尋、何茲全、王崇武、傅樂煥、董同龢、馬學良等。至於《史學與史料》則以岑仲勉的論文為主，岑仲勉，廣東人，由陳垣推薦入所，此外還有全漢昇、谷霽光等。後編為《集刊》第十五本，傅斯年在〈史學與史料發刊詞〉說：

^⑦ 李霖燦，〈殷曆譜二三事——為彥老逝世三週年而作〉，收入《董作賓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集》，頁50。

^⑧ 《傅斯年全集》第四冊。

^⑨ 同上。

本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因均稽有此知識。史料無，則不作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國，固為司馬光以至錢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為樂克莫母森之著史立點。史學可觀為絕對客觀者乎？此問題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客觀知識多矣，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此命名之意也。^⑩

傅斯年於此更申其〈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目標，《六同別錄》與《史學與史料》的論文作者，都是傅斯年自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北平後，自北大「少年文史學者」中，培養的「集眾」研究隊伍，現在已經長成。他們的史學論文寫作，都以傅斯年提示的原則為準則，這個準則即〈《中國上古史》編輯計劃的緣起及其進行過程〉所說：

史語所創辦的最大目的，就歷史方面說，在為史學作基礎工作；創辦人傅斯年先生認為這才是研究所範圍以內的事，也是本所人的主要業務。至於「通史」一類工作，本所同人雖亦有偶爾嘗試者，但只能算是進行有餘力的工作。^⑪

《中國上古史》從民國五十二年開始編寫，從這個〈緣起〉中的小注，可以發現，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謂「材料之內使他發現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的存而不補，證而不疏處理材料的方法，似乎遭遇困境，於是，又有另一派「少年文史學者」思量著如

^⑩ 同上。

^⑪ 〈中國上古史編輯大旨〉下之小注，《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一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民國六十一年。

何突破舊格式的限制，另謀新途了。^⑩

⑩ 這種「存而不補，證而不疏」的史學研究方法，錢穆《國史大綱》序，將其稱為科學派。錢穆說中國近世史學可分為三派，一曰傳統派，二曰革新派，三曰科學派。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又說考訂派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這種情形在編寫《中國上古史》待定稿時，遭遇到困境，所以勞榦在他的〈歷史的考訂與歷史的解釋〉說，嚴格的歷史學或狹意的歷史學是應當劃定範圍，不許越雷池一步。但對歷史的解釋工作自然也可讓有興趣的學者去做。鑒往知來雖然不是科學，卻在政論的園地中，有其立足之點。並且從解釋走到預測也是一個很順當的趨向，不是全無用處，可以給人一個希望，或給人一些遠境，使得人類社會的理想，更加豐富；收入氏著，《中國社會與文學》（台北，文星，民國53），頁135。待一個商量舊學，含孕新知的雜誌創刊，介紹西方史學思潮與方法，《集刊》既定的寫作格式，已經在蘊釀轉變了。